

## 亚美尼亚高等教育中“良好实践”的困境

苏珊娜·卡拉哈尼扬、罗伯特·卡恰特良

苏珊娜·卡拉哈尼扬 (Susanna Karakhanyan): 亚美尼亚国家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基金会 (National Center f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Foundation) 认证委员会创始主席、现任成员

电子邮件: s.karakhanyan@gmail.com

罗伯特·卡恰特良 (Robert Khachatryan): 亚美尼亚埃里温国立大学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研究员

电子邮件: robert\_khachatryan@yahoo.com

将“良好实践”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并加以推广, 希望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制度能够趋于一致并相互认可, 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一个重要发展。尽管出发点是高尚的, 但由于环境、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 这种转让和传播受到了阻碍。

### 借鉴良好实践

将从先进系统借鉴来的良好实践传播出去取决于多种因素, 如经济和社会需求、变革推动者、隐性和刚性机制, 以及驱动这些实践植入系统的价值观等多种因素。除非结合实际情况并以系统需求为前提, 否则良好的愿望很可能在途中失败。

前苏联各国受到先进高等教育模式的启发, 开始推广以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前提的良好做法。再加上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和大众化, 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浓厚的苏维埃传统与新的现实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同时努力恢复民族特性。直到 2005 年亚美尼亚正式加入《博洛尼亚宣言》(the Bologna Declaration) 之前, 亚美尼亚高等教育一直在经历高等教育模式的渐进式变革, 这种变革主要由主导高等教育机构发起。在批准《博洛尼亚宣言》之后, 亚美尼

亚政府率先进行了改革, 尽管已经过去了 18 年, 但系统性和制度性的变革仍受到质疑。与此同时, 亚美尼亚的高等教育系统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差异化, 出现了新型的办学机构。目前的高等教育格局由综合性和专业性大学、研究所、学院、音乐学院组成, 它们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 即国立(公立)、私立、政府间、跨国界。机构改革包括引入以自主权与问责制平衡为前提的新管理模式、启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课程改革。

### 不断变化的治理结构和资质要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苏联的做法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决定给予高等院校更多的自主权, 并将权力下放给由不同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校董会。尽管该国雄心勃勃地希望建立一个可持续和自主的高等教育体系, 并与强有力的问责制相平衡, 但其成果仅限于作为欧洲一体化承诺的一部分而采取的行动, 而不是有意义的系统性变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2014~2018 年通过的监管框架允许公立高等院校获得新的法律地位, 即从国家非营利组织转变为基金会。虽然旨在加强自治和企业功能, 但 11 所国立大学的经验表明, 在促进

民主化和提高竞争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就。2019~2022 年，亚美尼亚当局提出了一项新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法草案，该草案实际上限制了高等院校的自主权，并将更多的权力交还给政府，从而进一步挑战了该系统的民主化能力，从而与国际上常见的“良好实践”渐行渐远。

在莫斯科规定的所谓国家标准的指导下，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学历性质和水平因 2011 年基于《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采用的《亚美尼亚国家资格框架》（*the Armenian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而发生了转变。虽然《欧洲资格框架》促进了学术自由，但未能理解西方系统背后的逻辑及其成功因素，导致苏联和欧洲学历资格的共存。尽管采用了《亚美尼亚国家资格框架》，国家标准——一种苏联时代遗留的对高等教育机构课程内容施加影响的遗产——并未停止运作。通过《亚美尼亚国家资格框架》引入的两级体系（学士、硕士）事实上与苏联学历中五年制专科文凭加两级研究生博士学位（理科候选人和理科博士）并存，弊大于利。因此，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医学和健康科学，新引入的学位水平往往被认为缺乏合法性，未被市场认可，导致失业率上升。

改革议程上的其他“良好实践”包括：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通过引入“预期和已实现的学习成果”来实现课程的现代化；相关的评估方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发言权和选择权。然而，满足变革推动者需求的良好实践的关键因素被忽视了。例如，欧洲学分转移与累积系统（ECTS）的引入，几乎没有达到其主要目的，甚至在机构层面都没有付诸实施，更别说在整个系统内外了。

## 前进之路

亚美尼亚高等教育的关键系统转型和成功之一，是根据博洛尼亚行动方针建立了独立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在苏联时期，质量保障（许可和检查）完全集中在亚美尼亚共和国教育部，由指定的检查员根据国家标准进行。2008 年，通过建立一个以欧洲实践为前提的独立的国家质量保障机构，并引入程序和内容变革，发生了切实的转变，确保了对机构绩效的独立和客观评价。国家职业发展质量保障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Quality Assurance*）在欧洲和国际上都被公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质量保障机构，其运作符合欧洲标准和准则。该中心分别于 2017 年和 2022 年获得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和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注册机构（*The 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er for Higher Education*）的认可。尽管在建立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成功，但高等院校的内部质量保障仍然主要服务于合规目的，并没有促进持续的质量提升，从而导致了质量文化的失败。

通过传递和扩散良好实践来民主化亚美尼亚高等教育并提升其竞争能力的雄心壮志，由于对变革推动者投入不足，尤其是未能认识到文化和背景在设计改革中的关键作用，而偏离了期望的轨迹。深入理解在特定文化和背景中促成有效变革的因素，明确的愿景和价值观，竞争战略和优先事项，对系统和社会需求的全面分析，政府的完全承诺以及对变革推动者的授权，对于成功扩散良好实践至关重要。

注：本文为“下一代：前苏联高等教育的反思与将来”会议（Next Generation: Reflec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撰写。该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

高等教育研究所（UNESCO IESALC）和俄罗斯国立研究型高等经济学院（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于 2022 年 2 月 14-15 日主办。